

[家系列]

吴泰昌 著

我知道的冰心



冰心

[亲历大家系列]

K825. 6/406

2010



吴泰昌 著

我知道的冰心

冰

心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知道的冰心/吴泰昌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8

(亲历大家系列)

ISBN 978 -7 -108 -03454 -0

I . ①我… II . ①吴… III . ①冰心 (1900 ~ 1999)
—生平事迹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16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32 印张 11.25

字 数 148 千字

印 数 0,001 ~ 9,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在向阳湖，初见冰心	1
《追念振铎》	8
与巴金的世纪友情	14
“你念，我写”	33
“我也来凑份热闹”	41
“我爱的书”	50
冰心的生日	67
险闯大祸	86
与邓大姐相会在月季花丛中	93
“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103
“真正高兴的一天”	111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120
未成行的台湾之旅	128

为《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题名	134
主持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	138
“你的字草得利害！”	145
“向香港同胞问好”	148
1995年元旦这天	155
荣获雪松骑士勋章	166
玫瑰伴冰心远行	170
后记	174

在向阳湖，初见冰心

冰心是文坛祖母，她的作品影响了几代广大读者，许多我的前辈或师长都自称自己是冰心作品的“小读者”，那我更是小小的读者了。

我在读初中时就读到并喜欢上了冰心的作品。我的家乡安徽省当涂县，是长江下游江南的一座古城，李白就归终在这里。当涂中学也是座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校图书馆里存有不少图书，清代人的集子，还有现代作家的正版和盗版的本子，其中有冰心早期的《春水》、《繁星》和《寄小读者》等，我常常去借阅《繁星》，将其中优美的诗句抄下来，还能背诵多首。

1955年我从县城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实现自己的文学梦。听老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是从先秦开始的，听到王瑶老师讲现代文学史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但我们几位要好的同系同班同学晚上或假日，常在燕园未名湖石舫上相约畅谈文学，背诵自己喜爱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冰心的《繁星》里短小的诗句是被我们背诵最多的现代作家作品之一。“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好似我们面前平静的未名湖是汹涌澎湃的大海。

我进校的那个时期，北大常请一些文学大家来校做报告或座谈，如郭沫若、叶圣陶就来过。可我见到冰心，近距离地见到，还和她说上几句，那却是很晚很晚了。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因

为“特殊”，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别的清晰、深刻。

1964年春天，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作家协会首当其冲被砸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然后，斗、批、走。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当时不到三十，单身一人，自然要去。而一批老作家，也难幸免，真是“一锅端”。

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的先遣组二十九人，1969年4月12日出发，开赴咸宁县的向阳湖，大队人马于国庆节前夕9月28日坐火车离开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咸宁五七干校的人员中，包括谢冰心、臧克家、张天翼、陈白尘、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黄秋耘等全国知名作家。像陈白尘“文革”前就已调回江苏，黄秋耘也回了广州，郭小川也调离了中国作协，这回又集中到作协，一起下咸宁干校。

冰心比大队人马去得略晚些，因治牙病，请了假，于1970年元旦



五连战士下向阳湖水中拉犁，围湖造田。



作者在咸宁干校五连当挑夫。

后赶去的。郭小川因在接受中央周扬专案组调查写材料，也晚去的，大略比冰心早去几天。冰心和郭小川都有牙病，他们曾一起请假去武汉医院里治过牙，这是连里公开的事，有人戏称他们是“无齿之人”。

冰心在咸宁干校待的时间很短，大约个把月多点，她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干校去了，冰心的爱人吴文藻教授在那里。

我之所以能在咸宁干校近距离见到仰慕已久的冰心并有点接触，完全是因为我当时干的活种。我去了不久就被分到伙房当挑夫，任务是上午挑水，中午奔向阳湖给围湖造田的大批人送饭，下午再到分散各处有人干活的地方送一次开水，间或去附近集镇和咸宁县城买鱼、肉、豆腐，还有连部交办的要跑的一些杂事，每天几乎都能匆匆见到各处干活的人。

冰心一来就在后勤一摊，她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她先在饲养班，与年轻人一起抬过粪桶，抬的是干牛粪，据说连粪桶在一起也有二三十斤。喂过猪，更多的时间是在菜班，看守菜地，防猪牛和野放的鸡鸭弄坏菜地。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也在菜班，但她干的活是开辟菜地、种菜，冰心的活比她相对轻一些。冰心和张天翼是看菜地的固定

人员，缺了一个，临时补一个人，张光年、侯金镜也被补过看菜地。我和张天翼较熟，他爱人就在《文艺报》工作，他和北大吴组缃很好，组缃老师嘱我到了《文艺报》就去看天翼，天翼原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家就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国作协机关老址。

我和冰心说上话，也是在她和天翼看菜地时。我去送开水，天翼向冰心介绍了我：他是从北大刚来的，在《文艺报》。冰心望着我说：还年轻，现在的北大燕园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学，我待过，未名湖你也常去吧！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冰心时是怎么称呼她的，当时连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都称她“谢冰心”，后来同她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我在菜地脱口而出叫她“冰心同志”，她瞪着眼盯住我。我在1987年写的怀念天翼的文章《难忘的微笑》中说：“他和冰心一起看过菜地，冰心是坐在田头吆喝着赶鸡，天翼却是用散步去赶鸡，带着微笑散步……”冰心看过我的这篇陋作，她开玩笑说：你把我人画了……

我想起了在咸宁干校与冰心极少接触的点滴印象。

1995年《收获》杂志发表了冰心在咸宁和沙洋干校时期给家里人的一组信。我初次看到这些信的内容。有人在研究这组信，听说日本也有人在研究，并翻译出版了这组信。回想起来，我似乎见到过冰心在看菜地时插空在膝盖上写信的样子，也猜想这些信写好后是先交连部有关人员看后才寄出的。当时地方上的邮路还不畅通，天气不好，常几天没人来送信、取信。所以每当我要进城办事，连部秘书会叫我代发一些已封好贴好邮票的信，这位秘书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交信给我时点数要我签字，回来再向她汇报是否已投县邮局了。后读张光年出版的《向阳日记》1970年2月15日中的记载：“晚饭后（班长）孙一珍同志交给我阿蕙（系张光年夫人黄叶绿——笔者注）来信一件，我看是组织上没有拆阅过的，我当场交还她，说明政工组看后再给我。”在连里这些在接受“审查”的人，发出去的信先要给连部看，来的信件也是连部的人先看。我不知冰心当时寄信、收信是否也享受这种“待遇”。

新堂的寄书人

一首已忘的诗和那些而往的歌之歌，她的心灵已破碎了像风在
春深时不知冷与热也是一个心情不好的地方使人何忍？

冰心住在后园里下低了，或者静：平信，那差不多也好的是
她的环境，不用说她的寂寞吧，只有这样才好写信，不然信都写
不出或睡上床时，他们连感情力已不得开门了（一个地级市吗？）完
成日接报信，报来的都是些人的心事，这而无答的，是苦
愁。（4首）没有不有苦心的指针半生吃苦，欢喜走人生路的苦楚
者，看她的诗，不过而的也得在雨中（女而也许是人生苦楚）
又因为看单曲之歌以半生的阅读下半弦弦很（用诗语形容着）
除了脚掌觉得快之极！诗何其叶；一念身世，而一念同学高此
处而一次放下，却全忘了也不许说！但如此地并不麻烦，自己是乐，她
也这样了，她住在城市的，她的车多城市，喜事，但她的车少。但
这一生看开，家半有破缺，高地的，一个孩子，其钢其山，和山
如她的牛顿高下来的，早下的枝下好，接水而有归宿的上流的溪也
希望她的这一年能有光，现在看去，也许行，是行的。

今年报告，半亩花田半亩鱼塘，与静心同耕，是已习常
到此，知道别人高兴的个种事，或丁所走的路，或云，一切都活在
环境，如倘有时间一天多少事，还是半余，喜因忙而累，别人因忙而
倦，或半因有神心迷，得其威宣，莫非不倦吧！不如美妙时间，
在此之岁，都是消，或而亲（只有一两次）吃来也不怕，小船带半身用田
石拓革设备，25号回来，还静而周。

你拍手又回去（丁宁同去）当半年的军师，可已经变成了他的军师，
请她带来，现在下风，不让她走，要从了孩子，不能原罪，已知大老兄
记着节快菜！

1月19日

北京大兴区图书馆 由高69.8 信
九坡湖上而飞鸿信使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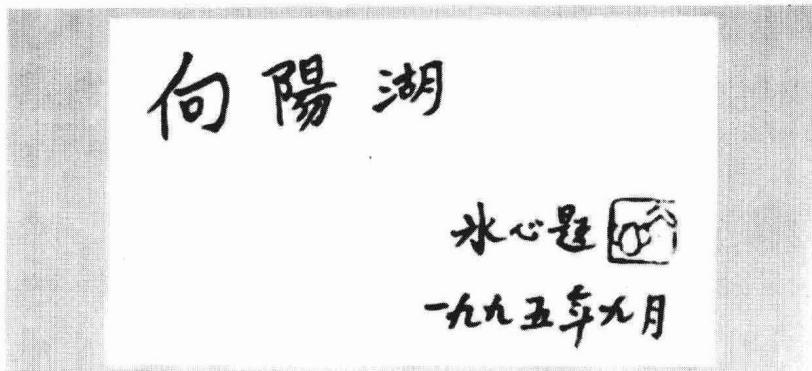
冰心在咸宁干校时的家信手迹。（1970年，冰心文学馆提供）

另一件小事，我记得大约是1970年2月中旬，冰心很快离开咸宁
干校转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干校去了。冰心临走的前一天，连长叫
我去问问谢冰心，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她代买的。我那时常去附近甘
棠等较大的集镇，冰心叫我如有柑橘就代买几个，说路上带着。

冰心离开咸宁干校，是先回北京再去湖北沙洋的。她走时的火车票本来该干校中转站代办，但冰心这么大年纪了，总不能让她坐硬座或站着回北京，一定要买张卧铺票，连部派我直接去咸宁火车站，带上连里开的介绍信去说明冰心的身份。因为咸宁火车站是个三等站，要通知始发站长沙或前方二等站蒲圻才能预订上卧铺，而路过咸宁的从广州、长沙开过来的特快是不停靠的，只有普通快车停靠。连部交代一定弄张卧铺，最好是下铺的。连部秘书写的介绍信上称“著名作家谢冰心”，原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有经验，他一看信，说这样写不行，咸宁人都知道我们来干校是接受改造和教育的，越“著名”越容易被他们感觉问题越多，反而办不成事，他向连长李季建议，不如给冰心戴上全国人大代表头衔，他说下面人是买这个头衔账的。李季说这样好，我带着重开的这张介绍信到了咸宁火车站，找到值班站长，他对作家冰心并不太了解，见到“全国人大代表”头衔很重视，痛快地答应立即电话与蒲圻站联系，说卧铺难有，座票一定保证。我又去干校中转站向买票的人作了交代说明。后来冰心返京的火车票是“卧的”还是“坐的”、“站的”，我就知道了。冰心走的那天，连里没有派我去咸宁送行。我只是在她离开连队时远远地向她招招手，记住她行前对我说过的话，“北京见，欢迎你到家里来玩。”冰心不只对我说过，还对同她一起干过活的几位年轻人也说过。

“北京见……”冰心这句极普通的话给我以极大的温暖，她对当时的处境比我们想得乐观。我当时以为这一辈子就在向阳湖待下去了，没敢想过回京，更没敢想继续做文学编辑工作。我们下干校前，军宣队一位政委就公开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

在咸宁干校待过的一些名作家事后有的写过回忆这段生活的作品。



冰心题“向阳湖”。

最早出版的是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后来则有陈白尘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和他的《牛棚日记》及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等。

冰心写过怀念李季、郭小川、张天翼的文章，但极少涉及在咸宁干校生活的内容，冰心没有留下回忆向阳湖那段日子的专文。

1995年冰心在医院里，咸宁地方来人去医院拜望冰心老人，告以向阳湖今日的变化，鄂南正在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筹建“向阳湖文化名人村”的消息。冰心老人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在向阳湖的一些往事，抱病一口气写了“向阳湖”三个字寄去。

《追念振铎》

冰心离开了咸宁干校，但她对我说的“北京见，欢迎你到家里来玩”这句话长久记着。我1973年从干校被借调到河北工作。1975年底，我从河北调回到正在筹备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社。1976年1月《人民文学》正式复刊。3月，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座谈会上突然见到冰心，那天与会的人很多，她只问我，你回来了？在《人民文学》？“欢迎到家里来玩。”



作者初次与冰心老人合影。(1978年)



冰心与吴文藻。(1977年10月1日，冰心文学馆提供)

《人民文学》比《文艺报》复刊早。《文艺报》1978年7月才正式复刊。我又被调回《文艺报》。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和平楼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单纯的拜望，而是带着《文艺报》派下的任务去的。由于“四人帮”垮台，1977年初，张光年接任了袁水拍当《人民文学》主编，光年同志接任后，提出多约些老作家的稿子。经叶老建议，我去拜访了钱锺书先生。在初次和钱先生的闲谈中，他多次提起郑振铎先生。使我萌动了想在明年郑先生因公殉难二十周年之际，约冰心写文章的念头。当时我向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叫我明年别忘了这个选题。1978年5月我又回了《文艺报》，我向编辑部又谈起了这个选题。1978年7月15日复刊的第1期《文艺报》出版，当时《文艺报》是月刊，每月15日出版，到这年的最后一期定稿前，我又向他们提起此事，冯牧说，版面再紧，第6期也一定要把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发出去，叫我赶快去冰心家，请她赶一赶。

郑振铎（1898—1958），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家。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使郑振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58年10月17日，以郑振铎为团长、蔡树藩为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十人，在北京乘飞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们乘坐的苏联客机“图104号”，在途经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时突然失事坠毁，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同机的我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六名出国人员，一起遇难。

10月31日上午，“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追悼大会”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首都各界代表共一千四百多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这个追悼大会。出席的有关方面领导人有陈毅、郭沫若、沈雁冰、张奚若、彭真、薄一波、包尔汉、叶季壮、周扬、廖承志、章汉夫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前立向遗像致哀。追悼会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致悼词，沈雁冰报告了郑振铎的生平事迹。追悼会结束后，郑振铎等十六位同志的骨灰被护送到北京西郊，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前矗立着庄严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

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是为增进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外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任务而牺牲的。他们当中有的长期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或者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有的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或者说是矢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和忘我的劳动，直至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遇难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这些刻在石碑上、经得起岁月侵蚀的响亮文字，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郑振铎一行遇难同志一生的很高评价。

为了表示对郑振铎不幸去世的深切哀悼之情，文艺界和其他战线一些老朋友纷纷撰文作诗，回忆彼此多年的难忘友情，充分肯定了郑振铎的贡献。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巴金等知名人士发表诗文对郑振铎的不幸表示诚挚的哀悼。巴金在《悼振铎》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一直颇为活跃于我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郑振铎，匆匆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历程。他一身而兼作家、文艺翻译家、文学编辑、文学史家数任，从文艺旁及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多有涉猎，著述累累，贡献良多。”“得到了我国许多著名的前辈文艺家、历史学家等的一致肯定和称赞，在广大读者中，也具有广泛而热烈的反应。”

我初次到冰心家去，就是带着这个紧急求稿任务的。冰心见我就说，你又回《文艺报》了？并询问了《文艺报》的一些情况，她痛快地答应写这篇文章，她说，我和振铎是除同学外在文艺界认识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乡，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振铎不幸逝世后，我当时没写，一直想着这件事，我放下手头其他事，为你们赶写篇短的，二三天后你会收到。她答应了，我心里感到踏实，她留我又闲聊了一会。这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冰心老伴吴文藻教授，我尊称他为“吴先生”，冰心笑着说，你们都是吴家的人……此后我每次去冰心家，进门先去看吴先生，吴先生话不多，说两句即叫我去和冰心谈，冰心老人见我就说，你看过你们吴家的人了。

冰心的《追念振铎》，发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6期。冰心在文中说：“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可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

追念振铎

冰心

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聂斯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者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那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

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那里，看到振铎给她们写的长信，里面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的很有好感。

这以后，他到了上海，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我自己也不断地为《小说月报》写稿，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直接通信。

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密切了。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床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就有《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都是我所从来未看过的。在我“因病得闲”之中，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和曾退先生共同编印《十竹斋笺谱》。他把收集来的笺纸，都分给我一份，笺谱印成之后，他还签名送给我一部，说：“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第三部就送给你了”。这一部

《追念振铎》刊《文艺报》1978年第6期。

‘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当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又说：“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